

客家与日本关系举述

“日本人不知怎的：对‘客家人’这个字眼很感兴趣。凡是用日文一提到它，他们均先睹为快，争看这些报章、杂志……”这是1992年9月在香港召开的“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钟清汉博士登上论坛的开篇发言。

的确，除东南亚一些华侨、华人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能跟日本一样，与客家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并对客家抱以如此浓厚的兴趣了。这种现象根源于客家迁日历史的悠久和客家精神在异国他乡表现依然并获得大和民族的尊敬。

一、客家与日本的渊源

日本与客家的关系源远流长。虽然日本学界“传说徐福是客家人”未必科学，但客家人至迟于明末成规模地东渡扶桑却史籍可考。据日本客家学者考证：明朝末年，因满人人关，中国不少忠臣、义民流落日本从事商业、僧侣或讲学。当时，日本政府为便于对外国人的管理，特指定长崎港与中国人进行贸易，于是，中国沿海如上海、宁波、福州、泉州、厦门、漳州、梅州、广州等地人氏，纷纷前往日本从事饭馆、裁缝、理发及其他贸易。这些人中就有不少是客家人。

直至清朝，由于满清政府与日本互设使馆，中日两国往来人事增加，而派驻日本的首任公使（相当于现在的大使）何如璋和诗人外交官黄遵宪又均为粤东客家人，并且他们的使命与表现得到中

日两国政府的重视,因而自此以后,广东、福建的客家人又陆续赴日寻求事业的发展。

清末辛亥革命前后,客家人流入日本与日俱增,仅横滨一地,由于之前有何如璋、黄遵宪来往此地,后来广东中山客家人孙中山又在那里先后成立横滨兴中会公会和中国同盟会,致使不少客家人纷纷向外追踪。日本客家研究者认为,辛亥建国时,旅横华侨6000余人中,大多是广东惠阳和宝安两县的客家人,以致当时横滨的客家人特成立了地缘兼乡缘组织——惠安公社,以联络和凝聚当地客家人的乡情,并求团结互助的目的。

二战时期,日本军兴,并发动了罪恶滔天的侵华战争,这时,日本的客家同胞基于民族大义,纷纷离日回国,因而客家人在日本急剧减少,仅横滨一地就降至千余。到战争结束,特别是日本经济复苏并腾飞之后,中日两国人事往来频繁,客家人移居日本又日渐增多。据日本客家总会统计,今日旅居日本并认同是客家人的约有5000余人,但如果将“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华人、华侨和具有客家血统者计算在内,则不下万人。

在这约万人左右的客家人中,涌现了不少知名的人物。他们跻身活跃于日本的政、商、学等各个领域,其中又以商界和学界为多,并且有的还颇受日本同行的尊敬。如现任东京崇正公会会长和留日东京华侨会总理事等职的丘进福先生,他是日本全国36所静电机工业株式会社之一的社长,也是日本担任社长职务的唯一外国人;而在学界,据钟清汉《日本客家研究序说》介绍,有名望的就多达60余人,其中如二战前曾任杏林大学董事长的林鼎乾博士、现任亚细亚文化综合研究所常任理事刘胜利博士、东海大学教授刘得宪先生、东京国际大学教授徐永新先生、名古屋外国语大学教授魏永吉先生等等,都是极受日本学界和在日的客家同胞尊敬的人物。

尤值一提的是,日本一些文化习俗还源于客家。以闽西客家对日本文化习俗的影响为例,如日本冲绳县的墓葬习俗即与闽西永定县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渡边欣雄根据冲绳《象吉大通书》所绘“天圆地方坟”图中所注“此图福建汀州府永定县大平里黄龙寨前张丙琳”为主要依据,著文推断日本冲绳流行的“龟甲墓”即为清中至清末由闽西永定人氏将闽西客家传统的墓葬形式传往日本的结果。又如被誉为东洋医学麻醉术鼻祖,并且其家族后人至今仍供奉祖师黄会友神位的魏士哲(日本名高岭德明),其令人仰慕的成就与造化也得益于闽西上杭人氏。据日本《那坝市志·家谱资料·魏姓家谱·四世士哲》记载:清初时期,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王孙缺唇待治。时有缺唇的琉球国海员那岭在中国福州经中医外科治疗四日痊愈,而此医师正是“福建汀州上杭县住人黄会友者也。有祖传补唇奇方周旋四方,疗治缺唇。”此事备受琉球驻福州驿馆四贡使关注,于是派驿馆总管魏士哲登门拜师,学成回国后奉召入宫治愈王孙缺唇,并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于三月蒙圣命,补唇疗治使课御医,从此补唇之医法国中广焉。”

二、日本与客家有关的组织

由于历史与生存环境等原因,客家人与其他一些民族和民系相比,普遍具有较强的念祖爱国和团结互助的观念,加上身处异国他乡,并且人数与当地人民相比占绝对弱势,因而在日本的客家同胞,成立了诸如客属总会一类以增进乡情、相互亲睦为目的的联谊性组织。另外,由于近代以来,客家民系屡有杰出而惊世的表现,其中如丘逢甲兄弟及日据台湾时当地客家民众英勇顽强的抗日保台义举和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等等,还让日本人尝受或见识过,这对于具有崇尚勇武和敬仰强者的大和民族,不能不抱以关注

和重视,甚至投入学术力量加以研究。因此,另一种与客家有关的组织——以客家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组织又在日本应运而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如下三个:

1. 人和会惠安公社。这是日本最早的有关客家组织。它成立于辛亥革命后不久的横滨。当时旅居横滨的 6000 余名华侨,受祖国辛亥革命胜利所激动和鼓舞,成立了旨在便于促进在日客家同胞亲睦和祖国亲人联系的人和会,会址在今横滨华侨市中区山下町所 104 番地。由于在这些华侨中多为客家人,并且又以惠阳、宝安籍客家人为多,因而人和会中又有惠安公社的组织。可惜的是,1923 年(日本大正二十年)9 月 1 日,日本关东发生强烈地震,包括客家华侨在内人民死伤无数;随后二战又起,客家华侨纷纷离日回国,加上二战结束前横滨遭盟军大空袭,所以在人去楼毁之后,会务也无形中中断,而且之后一直没有重建。至今这一组织留下的史迹,只有为当年遭地震伤亡的同胞所竖的震灾纪念碑,它存于今横滨中华义庄,令瞻仰者视之无不肃然起敬。

2. 东京崇正公会。这是目前在日本影响最大,并兼有学术研究和经济协同等功能的客家联谊组织。它成立于 1963 年的东京。当时,住在东京的一些客家人为求增进同胞的乡谊和继承祖先优秀传统文化,聚集了 80 余人在东京大饭店决定成立这一组织。1965 年 2 月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到会者 110 多人,以后会员逐年增加,至 1992 年已达 830 余人。他们每年都要举行一些活动,活动中要求大家讲客家话,而且还经常邀请祖籍国客家山歌名手前往演出,以求在乡音母语中唤起对故国家园的思念和追索客籍祖宗的渊源。值得一提的是,该组织还于 1980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在日本东京的太平洋大饭店与大阪的宝家大饭店,成功地举办了世界客属第 5 次恳亲大会。当时到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 33 个客属团体共 1200 余位乡亲代表,宏大的场面和浓郁的乡情,令日本

国人大为震惊,因而这一事件被日本各大报章和电视、电台详加报导。

3. 亚细亚文化学会客家研究部。这是日本带官方性质,并且机构和学术力量都非常庞大的亚细亚文化综合研究所下设的一个客家学术组织。亚细亚文化综合研究所成立于1977年,在为纪念成立十五年之际,特成立亚细亚文化学会,下设20个研究部,其中即有客家研究部。该组织一方面大力宣传客家文化,如支援日本广播协会NHK于1991年5月27日七点半开始播送45分钟的《客家——其巨大的土楼》的电视专题,后又促成其于6月28日上午重播;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展客家问题的研究,如其选书委员会出版的文集,第一集《中华思想与华侨》的第九章就为“中华民族中客家之地位与其文化特质”,对客家人历史表现与文化精神予以高度的赞扬。所以,这一客家研究组织对于向日本人民宣传和认识客家历史与文化,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三、日本对客家的关注

客家是汉民族一支重要而独特的民系。他们自晋唐以来,由于战乱和饥荒等原因,从中原移江南,再迁闽粤赣边和南方各省,甚至有的还流落海外异国。长期的辗转迁徙和拓垦山区的磨练,加上离开中原前就接受过汉唐文化的洗礼,因而使客家人形成一种兼集了坚韧不拔、爱国恋乡、尊师重教和团结互助的性格。日本是一个具有崇尚英武和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所以,对于客家精神和文化难免有所重视和关注。从竹越三郎的《台湾统治志》、共存出版社的《东亚共荣圈》等书有关文字和山口县造的《客家与中国革命》等论述可知,日本早在20世纪初就对客家问题具有相当的认识和介绍,并且这种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强烈。

日本对客家的关注,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普遍心态。这在本文

开头所引的客家学者言论中就可见出一斑。本文在此举三方面事象加深读者的认识。

其一、对客家文化的兴趣。日本对客家某些文化事象的兴趣，可以说几近于如痴如醉的程度，如一些研究者把客家妇女与日本妇女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后者之贤良耐苦不及前者；再如有的学者还对客家饮食极力探考，并写出洋洋大观的巨著。当然，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国民对客家土楼的向往。据客家土楼最集中、最壮观的县份——闽西永定县旅游部门介绍，该县每年接待前来参观土楼的外国游客以日本人最多，而且多次来人进行影视制作，其中前几年还通过中日友好协会往永定拍摄以土楼为主要题材《血脉相连》专题；另外，茂木计一郎及日本建筑专家还写出有关土楼研究的专著……这种近乎“狂热”的劲头，连东南亚一些华人、华侨较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相比。

其二、对客家精神的敬佩。早在近代，日本学人山口县造在其《客家与中国革命》中，就认为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按：客家是汉族的一支民系，不是一个民族）。以后许多日本著述中，都不可思议地极力夸赞客家精神，而且在二次大战日军侵华时，有个事象很耐人寻味，那就是日军东占了漳州，南据了潮汕，西略了湖南，北入了赣州，唯独聚居了一千多万客家人的闽粤赣边一直没有侵入。这是否与日本人对客家精神的敬畏有关？因为历史上日本军人屡次领教过客家人的英勇善战，如明末东莞客家陈璘率五千两广客家子弟抗日援朝抗击日军，清末台湾客家群众自始至终英勇顽强抗日保台等等，因而对客家精神所激发的力量能不抱以谨慎和畏惧？

其三、对客家研究的重视。除中国本土之外，在国际客家学界，日本可以说是学术力量最强且最有成就的国家，不仅重视得早，而且还涌现了不少学者名家和有深度的成果。就当代而言，象

中川学、渡边欣雄、钟清汉、坂元宇一郎、茂木计一郎、周达生、高木桂藏等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客家研究专家，并且如高木桂藏的《客家》、周达生的《客家文化考》、茂木计一郎的《中国客家民居建筑》等著作，中川学的《华人社会与客家史研究的现代课题》、《关于客家在中国及东南亚的历史地位》和《中国客家史研究的新动向》等等，都是立意新颖、取证广博，颇见学术功力的巨著力作。此外，还如前所述，成立了客家研究的专门组织。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了日本学界对客家问题研究的重视，对于国际特别是我国客家学事业发展也起到巨大的诱导和推动的作用。

原刊闽西客家学研究会主办《客家纵横》1994年第一期。

客家与香港关系漫说

在香港,洋文满目,粤语盈耳,但揭下欧风粤俗的面纱,你将看到这颗“东方明珠”,竟刻着一道道客家人文的印痕。

一、香港的客家人文背景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鸦片战争以前,香港与其毗邻的深圳,同属于广州府新安县所辖。鸦片战争后,构成今日香港地区的香港岛、九龙、“新界”及其它离岛,相继被英国殖民者强占或“租借”,从此,香港沦为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霸占时间最长的中国领土之一,给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一道难以抚平的伤痕。

香港现有土地 1092 平方公里,人口 630 余万,其中客家居民约 170 万(一说 200 余万,占全港总人口 33.3%),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客家人在香港居民的比例远远比现在还大。这是因为,开基香港的五大姓氏——廖、邓、文、侯、彭,他们去港祖籍多在客家地区,如廖姓廖仲杰原籍福建汀州,邓姓邓符协原籍江西吉水,文姓文天瑞为民族英雄文天祥堂弟,彭姓彭桂、彭迪然父子原籍广东潮州揭阳地区,所以,早在 300 多年前,香港就有“客家村”之称;另外,在鸦片战争前,深圳与香港在人文、历史和地理方面同属一个共同体,而深圳今日本土的原始居民中,客家人占了 60% 以上。由此可以推断: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前,客家人在当地居民中起码占有一半左右。所以,在香港,客家人文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浑厚的底蕴。

二、香港客家源流与分布

客家徙居香港由来已久，史籍可考者，最早可上溯至宋代，这就是现居于“新界”粉岭、扫管笏等地的客家彭氏。据“新界”粉岭《彭氏族谱》记载：北宋籍于江西庐陵的彭延年为潮州知事，后隐居潮州揭阳县浦口村，北宋末年迁居东莞。至南宋，彭氏桂公携子迪然徙居新安县龙山，然后定居粉岭。桂公繁衍至今已历 25 代，散居“新界”各地裔孙达 4000 余人。

彭氏抵港后，徙居香港的客家姓氏逐渐增多，元朝有籍可考者有廖、吴、刘诸姓。明代以后，香港经济日渐发达，特别是清代康熙明令沿海复界招垦之后，“客家由江西、福建及惠、潮、嘉等处，负来横径，相率而至。”（何肇椿《新安县土客合办官办高等小学堂例案序》）他们大多经沙头角到九龙城、香港仔、荃湾、柴湾一带拓荒开垦。徙居柴湾一带的 5 个客籍家族，后来建立了大坪村、西村等村庄，并以姓氏为名各建自己的屋村——罗屋、成屋、陆屋和蓝屋等。到香港割让英国后，因城市初建，需大量劳力，这时涌入香港的客家人如鲫鲤过江，源源不断。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徙居香港的客家人，与同期抵达的广府、闽南、潮州及其他各地民系人氏一道，为香港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而努力拓垦耕耘。

值得一提的是，居住在香港的客家人，其祖先大多曾徙居过闽西。据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杨耀林《深港客家源流考》所举 11 个香港客家主要姓氏源流显示：这 11 个姓氏中，有 9 个姓氏的入闽祖在闽西。这一现象再次说明：闽西是香港客家的祖地。

香港的客家原住居民，似乎多未改变其祖先的历史命运而承袭着先人的生活习性。他们多居山处僻，所以，主要分布在“新界”丘陵山地、九龙半岛及其他离岛。

三、香港客家的名胜古迹

客家徙居香港历史悠久,自然给香港留下一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点缀于高楼广厦间的客家人建筑的名胜古迹,就是一个明证。

香港景观很多,但多是由这座现代化都市所衍生的摩登建筑与游乐场所,至于具有中华传统风格和文化内涵的名胜古迹,则显得微乎其微。于是,香港客家人上百年前所建筑的居民住宅,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并受人珍爱。它们多被港英政府列为“法定文物”,或僻为民俗博物馆,如“新界”上窑黄氏“客家民俗博物馆”、荃湾陈氏“三栋屋民俗博物馆”、沙田“曾氏大屋”、元朗坳头“潘屋”,以及新近修建的柴湾“罗屋民俗博物馆”等等。

这些香港的客家民居,其建筑风格和文化功能,与闽西土楼和粤东围龙屋一脉相承。如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荃湾陈氏“三栋屋”,主体部分为前、中、后三大厅及左右横屋。三大厅各为一进,厅与厅之间为天井所隔。前厅安放车轿杂物,中厅作为客厅,后厅专以祀祖(故又名祖祠),所以,是典型的客家“三堂式”民居。又如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沙田曾氏“山厦围”,它是典型的客家“五凤楼”民居。其四角所筑炮楼枪眼,只不过突显了大楼的防御功能,而占地 6000 余平方米的规模,更显得与闽西一般大型土楼相比也毫不逊色。

提起香港的客家名胜,人们自然会想到虎豹别墅(又名胡文虎公园)。这座公园式建筑,位于香港大坑山麓的利群道,占地万余平方米,是 20 世纪三十年代由闽西籍客家侨领胡文虎所建。园内别墅采用中西合璧格调,画梁雕栋,富丽堂皇。别墅四周有假山花园、苑池球场及亭台榭阁,还有表现“二十四孝”与天官地府之类的艺术壁画。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内涵浑厚,因而素有“东方狄尼斯花园”的美誉。本着“独乐”与“众乐”的建筑本意,自建成起,主

人就把公园免费向外开放,所以,每天有众多港人和海内外游客在此游憩观赏。

四、香港客家人主要职业

香港的人口构成中,除早期原住居民外,其余多是不同时期,特别是英国占领香港后从内地迁来的移民。他们中,有为避战乱而来的民族工商业者和资本家,但更多的是因生计所迫而赤手空拳闯天下的热血青年。内地客家地区多是山贫地瘠、谋生艰难,这就决定了徙居香港的客籍人氏以后一类移民为多,并且从事的职业主要在体力、手工、国货及经营中小型企业方面。

早期在港客家人的主要职业之一,是以打石为主的基础建筑。这是因为,英国占领香港后,建设城市需大批建筑劳力,这时,以擅长采石的粤东特别是五华、兴宁和饶平等地的客家人便大量涌入香港。他们主要在香港东端的筲箕湾、西端的石塘咀一带打石谋生。香港不少的政府楼厦、市内街道和天桥基础工程,即多由这些客家人开办的工程公司承建。

在港客家人的另一种主要职业是藤器制作。香港的藤器业90%由客家人经营。这里藤制的家具以出口美国为主,其中仅藤面塑胶家具一项,在1971年就值316万港元,约占香港藤制家具出口总值的十分之一,连产藤国的印尼也向香港订制。这些制作藤品的工厂,多设在九龙半岛北部山区,并以九龙仔最为集中。

香港客家人经营的国货公司遍及港九、“新界”,在当地同行业中一枝独秀。它的鼻祖是成立于1955年、设于湾仔的“中天公司”,而“裕华”、“中华”两大国货公司是香港同行中的佼佼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客家人在香港开设的国货公司至少达160余家,除30余家零售外,其余都是批发。不少外国华人和朋友,通过香港国货公司邮购大陆商品,而到香港的游客更成为国货公司

的顾客,其中中国产的药材、工艺品和名酒等,最为外国人士所喜爱。

香港的文化、教育、工业等行业,也有不少客家人经营,其中工业又以中小型企业居多。如纺织印染业中,客家人经营的工厂遍布九龙城、新蒲岗、官塘、大沙湾一带,其中布厂就有 100 余家,“义和泰”、“联义”等就是较具规模的工厂。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这些纺织漂染厂曾成为中国抗战军服装备大后方之一。

总之,在香港的发展与繁荣中,客家人经营的行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五、香港的客属社团组织

客家素有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传统。徙居海外的客家人,因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力量单薄,这种情结显得尤为强烈。于是,各种以联谊、励志、互助、救济等为目的的地缘、业缘、血缘和族缘等性质的客属组织,在海外华人社区遍地开放,成为海外华族人文的一道独特风景。在香港,这种现象也不例外。

据统计,在港的客属社团组织不下 30 余个。它们以地缘和业缘组织为多,如地缘方面有旅港闽西同乡会、惠州同乡总会、永靖同乡会等;业缘方面有香港嘉应商会、侨港惠阳商会等。这些组织多以团结乡亲、联谊同行、互勉志业、发展工商、救灾恤贫、兴学育才等为己任,为客家乡亲初抵香港得以立足和发展,以及减轻政府的社会负担,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港的客属社团组织中,最著名者当属香港崇正总会。这是在港唯一的族缘性客属组织,几乎囊括了所有在港的客家族群人氏,而且会员遍布世界各地。它仅在香港的会产就有跑马地摩理臣山道 13 层巍峨的崇正大厦,九龙城中西合璧的崇正大楼,深水涉广利道的崇正中学和崇正小学,以及南湾海泳棚和其他康乐场

所等等。会员之多广，规模之宏大，在海外客属组织中首屈一指，而且在海外华人社团中也属罕见。

香港崇正总会创立于1921年9月29日，自创立始，便立下勉励同人，共谋公益，考证客家源流，弘扬客家文化；爱国家，爱民族，甚至爱全人类的宗旨立场。它出书出刊，广泛交往。编印出版了十五卷本《崇正同人系谱》巨著，还编辑出版《崇正同人月刊》、《崇正导报》等报刊；其领导人不仅与海峡两岸有关要人有所接触，而且与世界各地客属名流多有来往。自成立以来，凡旅居香港的客籍名流，如已故的胡文虎、胡文豹、张发奎、罗卓英、陈金枝等，当世的胡仙、姚美良等，都曾担任这一组织的永远名誉会长、会长或理事长等职，所以，在香港乃至世界各地客属中，都有不同寻常的影响。1996年，由现任理事长黄石华先生率领的崇总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主要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原刊《客家纵横》1997年第二期及《今日中国》1997年第十期。

客家与澳门关系简述

在澳门回归前 300 天之际,闽西客家艺术团应澳门客属社团联合总会邀请,赴澳门进行为期 5 天的演出访问。共 5 场演出,观众达万余人次,其中在市政厅广场和祐汉公园的两场演出,都是进行了 2 个多小时节目完毕后观众仍不愿离去而要求继续表演。这种热闹而感人的演出场面,当地人士反映在澳门实属空前。

闽西客家艺术团在澳门的演出取得如此成功,固然应得益于演员们精湛的表演和邀请者的精心组织,但同时与澳门观众对演出团体及其表演节目抱有特殊的情感也有很大关系,因为澳门与客家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

一、客家迁澳的历史轨迹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据文物考证,早在 6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曾在澳门活动;见诸于文献记载,则迟于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澳门就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而成为南海郡番禺县的一部分;1152 年,南宋设香山县,澳门改属香山县所辖,但 400 年后便被葡萄牙人一直占据。不过,澳门真正出现华人定居村落则始于南宋末年。据史料所记,南宋咸淳七年(1271 年),元军攻陷宋朝都城临安(今杭州),宋室重臣张世杰、陈秀夫、文天祥等拥末帝赵昀分别于水陆南下避难和勤王,几经周折来到南海,却因台风狂袭而临时驻扎于澳门,后来元军追至,经崖山激战,宋军大败,宋帝也溺海而崩,于是,一部分败散的南宋兵民就定居于澳门而成为当地最早的居民。以后经 300 年休

养生息和流动,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澳门人口已达5000人以上,成为当时颇具规模的一个华人社区。

据史籍和众多客家族谱记载,元军攻陷临安后,文天祥等曾在赣南、闽西和粤东一带募兵勤王,而且当地客家子弟多有响应。其中特别是粤东梅县卓姓一族,共有800儿女随文天祥而去,并且经崖山海战后仅有一人返乡。清末大诗人黄遵宪所赋“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戴天来再破荒。”就是对客家人这一悲壮历史的追述。因此可以断定,在最早定居澳门的人氏中,必然间有一些客家的子民。相传今澳门凼仔岛的卓家村,就是当年卓氏族人开基之处。

自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起,葡萄牙人先后以贿赂清朝地方官员和纳缴地界租金等手段得以在澳门留居。其后葡人为进一步扩张和供外国商人旅居而进行城市建设中,雇佣了许多闽粤劳工,而当时闽粤客家地区正值人口高峰,因生计所迫有不少客家子弟前往澳门。光绪《香山县志》卷十三所述:“过路环,即盐灶湾,今客民私采石处。”说的就是清代客家人在澳门开山取石以建设城市的情况;同书卷五又载:早在道光年间,这些采石者就“屯集至数千人。”由此可见,清朝时期客家人定居澳门已相当可观,并且为早期澳门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进入到20世纪,澳门又吸纳了共5万多华侨前来定居。这些华侨以来自客家人众多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主。因此,时至今日,在澳门约46万人口中,客家人占有10余万之众,成为促进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二、客家与澳门天后宫

1553年,葡萄牙人初临澳门,正好在距今有500多年的妈阁庙前海滨登陆。他们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人们指着那座寺庙回

答：“妈阁。”于是，葡萄牙人就以葡文“MACAO”命名澳门并流传至今。

妈阁(MACAO)就是妈祖庙，客家人和闽粤人又俗称之为天后宫。它不仅是西方对澳门的称呼，而且是澳门一道重要文化风景。如今在澳门共有天后宫 8 座，其中澳门半岛 5 座，即妈祖阁、莲峰庙、望厦天后宫、观音堂内天后宫与马交石后天后宫，另有凼仔岛市区和卓家村各 1 座，路环岛 1 座。这 8 座天后宫中，最引人注目者则是路环岛那座，这是因为它树有一尊高达 19.99 米的妈祖雕像，远目而视仍极显雄伟而庄严。据澳门基金会出版的《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所引史料所记，路环天后宫“创建于康熙十六年……经乾隆十八年重建，道光廿二年扩建，同治一年重建，1963 年重建。”可见其现在规模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年所奠定。

以福建莆田女子林默为原型的妈祖，原本是东南沿海渔民敬奉的海神，因其被赋有佑民除灾的无边法力，加上历史上客家有不少人出洋谋生，所以信奉妈祖在客家地区也极为盛行，并且凡林姓聚居地和主要江河沿岸都建有天后宫。澳门 8 座天后宫到底有几座客家人参与了建筑虽无详细史料可考，但至少路环岛那座的今日规模是由客家人奠定却是有据可查。《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所引《葡占凼仔、路环碑铭匾汇编》录有路环天后宫内两处碑铭，一是镌刻：

河清海晏永籍慈航普渡

民安物阜恒沾圣德匡扶

道光二十二年孟冬吉旦重修

绍官 善璋 任恭

嘉应乐邑沐恩弟子谢任尚 明基 任德 仝敬奉

任良 任让 成发

另一是刻于庙内石柱：

道光二十二年孟冬吉旦重修

嘉应乐邑沐恩弟子谢善 善球 善信敬奉

由此可见,路环岛天后宫这一澳门重要的文化景观的建筑,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粤东嘉应州客家人的善举。

三、孙中山与澳门的情缘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是客家人。据客家研究泰斗罗香林教授所著并由孙科作序的《国父家世源流考》记述,孙中山祖先于唐朝末年从河南陈留迁于赣南宁都,然后迁闽西长汀又迁广东紫金直至香山。孙中山即出生在香山县永宁乡大字都(今中山市翠亨村)。这里距澳门仅 37 公里,孙中山的父亲就曾在澳门当过鞋匠。所以,孙中山先天注定与澳门有种特殊的缘份。

孙中山的家乡是著名的侨乡,所以,孙中山从小就容易获得外界信息并憧憬着外部世界。13 岁那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而随母亲经澳门登上“格兰诺曲”号英轮前往檀香山。因此,澳门是孙中山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起点。

在檀香山生活了 4 年后,孙中山返回故乡,然后分别求学于香港、广州等地,并于 1887 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进行 5 年的研读医学,以“最优异”的总成绩毕业后,于 1892 年秋应澳门镜湖医院邀请前往澳门行医,成为中国籍西医师在澳门开业第一人。由于医德很好,待人亲切,而且无论门诊或出诊,诊费一律由病人随意而付,加上医术精明并特别擅长外科手术和治疗肺病等,因而大得当地人们赞誉,在澳门行医“不满三月,声名鹊起”,“就诊者户限为穿”,以致一些当地人士自发于 1893 年在澳门创刊的《镜湖丛报》两次刊登《春满镜湖》,介绍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情况,而且其文告开篇首句即谓:“大国手孙逸仙先生,我华人而业西医者,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名师游,洞窥秘奥。”可是,由于声名日隆,